巴金三学日语

陈喜儒

巴金先生生前有个遗憾，就是没有学会日语，不能用日语直接与日本朋友谈心。其实，巴金很早就开始学习日语，但因种种原因，三起三落，没有学成。

第一次，是在成都，十六七岁。他说："我两个叔父在光绪时期留学日本，回国以后常常谈起那边的生活。我对一些新奇的事物也颇感兴趣。后来我读到鲁迅、夏丏尊他们翻译的日本小说，对日本文学发生爱好，又开始自学日文，或者请懂日语的朋友教我认些单字，学几句普通的会话，时学时辍，连入门也谈不上。"

第二次，三十岁，为了学习日语，自费去日本留学。他说："1934年我在北平住了好几个月，先是在沈从文家里做客，后来章靳以租了房子办《文学季刊》，邀我同住，我就搬到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去了。我认识曹禺，就是靳以介绍的。曹禺在清华大学做研究生，春假期间他和同学们到日本旅行。他回来在三座门谈起日本的一些情况，引起我到日本看看的兴趣。这年七月我从北平回到上海，同吴朗西、伍禅他们谈起，他们主张我住在日本朋友的家里，认为这样学习日文比较方便。正好他们过去在东京念书时有一个熟人姓武田，这时在横滨高等商业学校教中国话，他可能有条件接待我。吴朗西（不然就是《小川未明童话集》的译者张晓天的兄弟张易）便写了一封信给武田，问他愿意不愿意在家里接待一个叫'黎德瑞'的中国人，还说黎是书店职员，想到日本学习日文。不久回信来了，他欢迎我到他们家做客。"（《巴金全集》20卷61页，《关于〈神·鬼·人〉》）

1934年十月六日，《文学社》出面为巴金饯行，鲁迅茅盾也来欢送。那天鲁迅很高兴，说了许多日本风土人情，也说到有些中国留学生因为语言不通而闹的笑话。鲁迅对巴金说，到那边文章也要多写。巴金问他，听说先生要去日本休养，为什么还没去？鲁迅笑道：将来再说吧。谈到有些作家被捕，他们心情很沉重，也很愤怒。

巴金去日本留学时，没用笔名、也没用原名李尧棠，或字芾甘，而用化名黎德瑞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他说："我改名换姓，也不过是想免去一些麻烦。早就听说日本警察厉害，我也作了一点准备。为什么叫'德瑞'呢？1934年上半年我和章靳以、陆孝曾住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时，常常听见陆孝曾讲他回天津家中找伍德瑞办什么事。伍德瑞是铁路上的职工。我去日本要换个名字就想到了'德瑞'，这个名字很普通，我改姓为'黎'，因为'黎'和'李'日本人读起来没有区别，用别的姓，我担心自己没有习惯，听见别人突然一叫，可能忘记答应。我住下来以后，果然一连几天大清早警察就跑来问我：多少岁？或者哥哥叫什么名字？我早就想好了，哥哥叫黎德麟。吉庆的字眼！或者结婚没有？经过几次这样的'考试'，我并没有露出破绽，日本警察也就不常来麻烦了。"（《巴金全集》20卷581页，关于《长生塔》）

那么，巴金所说的"麻烦"，是什么呢？我想，可能有两点：一是1931年"九一八事变"后，巴金写了大量谴责、批判、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文章；二是巴金已发表《灭亡》《家》《雾》《雨》《电》等大量作品，在中国文坛如日中天。用笔名巴金去日本留学，必然会引来日本警察、宪兵、特务的骚扰和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们的注意，既不安全，也无法安心学习日语，所以起个化名，这样就可以免去一些"麻烦"。

巴金到达横滨时，武田夫妇带着儿女，全家打着欢迎"黎德瑞"的小旗来迎接。武田是个老实人，但他信佛，而且很虔诚，每天早晚都要念经，还不时到海边抛撒供物，在家里驱鬼、禁食。巴金对他的迷信很反感，说："开始写《鬼》的时候，我就下了决心离开武田家搬到东京去。……我本来应当在武田君家里住上一年半载，可是我受不了他念经的声音，可以说是神和鬼团结起来把我从他家赶了出去的。我原先学习日文的计划也给神和鬼团结的力量打破了。我向主人说明我要搬去东京的时候，武田君曾经恳切地表示挽留。然而想到在这里同神鬼和平共处，我实在不甘心。"（《巴金全集》20卷614页，关于《神·鬼·人》）

巴金由横滨搬到东京，住在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（简称中华青年会），对这里的生活学习环境比较满意。他说："在东京我住在中华青年会宿舍里面，一个人一间屋，房间不大不小，陈设简单，房里有个两层的大壁橱，此外还有一张铁床，一张小小的写字桌和两三把椅子。楼上房间不多，另一面还有一间课堂，白天有一位教员讲授日语，晚上偶尔有人借地方开会。楼下有一间大礼堂，每个月总在这里举行两次演讲会。我初来的时期杜宣、吴天他们正在大礼堂内排曹禺的《雷雨》，他们通常在晚上排练，我在房里听得见响动。楼下还有食堂，我总是在那里吃客饭。每天三顿饭后我照例去散步。

"中华青年会会所在东京神田区，附近有许多西文旧书店，可以说我每天要去三次，那一家店有什么书，我都记熟了，而且我也买了不少的旧书，全放在两层的大壁橱里。……买了书回来常常看一个晚上，却不怎么热心学习日语了。不过我还是到楼下办公室报了名，听陈文澜讲日语课。我记得是念一本岛木健作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，他的讲解还不错，只是我缺少复习的时间，自己又不用功，因此我至今还不曾学好日语。回想起来，我实在惭愧得很。"（《巴金全集》20卷617页）

巴金爱读书，爱买书，住在神田，如鱼得水，但好景不长，1935年四月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到东京访问，日本警察开始"大扫除"，拘捕可疑的中国人。

四月六日凌晨，在溥仪到达东京的前一天，警察闯入巴金的住处，查抄书信，并将巴金带到神田警察署审讯。巴金说："他们在我的答话里抓不到辫子，不久就结束了'审讯'，向我表示歉意，要我在他们那里睡一晚，就把我带到下面拘留所，从凌晨两点到下午四点，整整关了十四个小时。"（《巴金全集》20卷619页）

值得庆幸的是，日本警察没有发现巴金用的是化名，否则很可能被驱逐出境，押送回国。

这是巴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抄家、抓捕、审讯、关押，极大地伤害了他的人格尊严和民族自尊心，他不想继续留在日本，对日语也失去了兴趣。恰巧这时吴朗西、伍禅在上海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，让巴金回去当编辑。巴金本来计划在日本留学一年半，但只住了十个月，就提前回国。

第三次，巴金已年逾古稀，又开始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日语讲座，学习日语，但因年事已高，体弱多病，著述繁忙而中断。

巴老虽然一直为没学会日语而耿耿于怀，但毕竟下过苦功，而且是童子功，到了晚年，还能用日语全文背诵武者小路实笃的《致幼小者》。阅读能力也很强。1977年八月，井上靖到上海，赠巴老《桃李记》，其中有怀念老舍的文章《壶》。巴金在日记中写道：九月一日，当夜发烧，咳嗽渐剧，十一点半前睡。睡不着，翻了翻井上《桃李记》，看到《壶》，读了一遍，感想甚多。九月二日，到机场送中岛、井上，与井上谈读过《壶》后感想。另外，我给巴老当翻译时，看他的表情，回答问题的速度，就知道他能听懂不少，但说比较困难，主要是不习惯，张不开嘴，所以巴老说，至今"不能用日语直接同日本朋友谈心"。

有一次闲聊，巴老问我用什么日语辞典，我说以前用商务印书馆的《日汉辞典》，现在用我母校大连外院编的《新日汉辞典》。这本辞典词量大，释义精准，新词多。巴老说，词量大、新词多的辞典才好用。又说：大连这个地方懂日文的人多。六十年代访日时，给我们当翻译的刘德有、安淑渠都是大连人……

巴金不仅是伟大的作家，也是杰出的翻译家，懂英文、法文、俄文和世界语，也学过德文、意大利文、日文、朝文、越南文，有《巴金译文全集》十卷，约三百余万言，但由于年轻时"失去了学习日语的劲头"，在他的译著中，日本文学作品很少，仅在第五卷中收入了石川三四郎的《春月之死》和《忆春月》两篇短文，在第七卷中收入了秋田雨雀的《骷髅的跳舞》《国境之夜》和《首陀罗人的喷泉》三个剧本，而且不是从日文直接翻译，是从世界语转译的。

年轻的巴金未能如愿在日本完成留学，使我们失去了一位日本文学翻译家，不能不说，这是历史的遗憾。

谜园
（油画）
何 军

姑苏台畔夕阳斜

——苏曼殊与苏州

黄 轶

如果江南缺了苏州，不知道还算不算江南？吴侬软语、香糯美食、小桥流水和名园佳苑，还有吴越争霸流传下来的千般传奇万般故事，再有张继、白居易、范仲淹、苏轼、唐伯虎、金圣叹、龚自珍等无数迁客骚人和无涯诗文词曲的渲染升华，苏州不想做江南的"代指"恐怕都说不过去吧？而像苏曼殊这样一位多情诗僧，若说不爱上风致无二的苏州，恐怕也断不可能！

苏曼殊第一次行脚苏州，是在1903年。早此，苏曼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中国留学生部读书，加入青年会，结识陈仲甫、张继等，这是其参与革命活动的开端。1903年春，参加"拒俄义勇队"，与黄兴、陈天华等被编入学生军甲区队第四分队，终于惹起经济赞助人的不满，停止资助。秋季，苏曼殊不得不弃学归国，与出身苏州名门的吴帙书、吴绾章兄弟同船。他此间写下传世的第一首诗作《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》，表达了"易水萧萧人去也"的雄浑气概。航船先抵上海港，这是苏曼殊在1898年初春自上海东渡日本横滨后第一次故地重游，但举目无亲，旋即和吴氏兄弟一起到了苏州。在苏州，苏曼殊接受了他的第一份职业：先是受聘吴中公学社英文教员，后来又到祝心渊创办的唐家巷小学任职。

这次旅居苏州，对苏曼殊一生影响深远，苏曼殊后来加入南社以及与一众通俗作家和上海文人群的交游，与此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那时，苏曼殊还叫苏子谷，瘦怯怯的，因不懂吴语，沉默寡言。他在吴中公学社结识了后来成为著名通俗小说家的苏州人氏包天笑，初见时二人只能用笔作谈，慢慢地苏曼殊能听懂方言了。早年在日本大同学校读书时，十五六岁的苏曼殊即在绘画上显示出天赋异禀，曾兼教学校美术科。据包天笑《钏影楼回忆录》所记，在苏州任教时，绘画成为苏曼殊一大嗜好，他常常拿绘稿赠送友人，其中就有《吴门闻笛图》和《儿童扑满图》。《吴门闻笛图》上曼殊题曰："癸卯入吴门，道中闻笛，阴深凄楚，因制斯图。"1950年代，香港收藏家刘均量购得此图。1971年，96岁高龄的包天笑题诗于《吴门闻笛图》："曼殊骑驴入苏州，柳色青青笛韵幽。卸却僧衣抛去笠，偏教遗墨作长留。""渡海东来是一癯，芒鞋布衲到姑苏。悠悠六十年前事，忆否儿童扑满图。"《儿童扑满图》乃当年苏曼殊专为包氏所绘，寓意扑灭满清。

1903年秋末，苏曼殊还与友人相约吴郡西郊狮子山，"招国魂"以警醒睡狮——他们在幡上画着狰狞威武的雄狮，希冀"扫清膻雨腥风日，记取当时一片幡"。包天笑的小说《海上蜃楼》详细记述了他们这些交游经历，他说："那时的朋友中，有苏玄曼……等，同在苏州当教员。"这里的苏玄曼就是指苏曼殊。在苏曼殊受聘上海报馆离开苏州时，包天笑曾赋《送别苏子谷》二首，抒写"沉沉歌哭叩天阍"的郁闷，发表于陈仲甫主持的《国民日日报》。

苏州这座历史悠久的名城自此像一粒花种，埋在了苏曼殊心中，待机缘巧合便发芽开花。他后来交往的诗朋酒友中有许多苏州人，例如祝心渊、陈去病、柳亚子、郑桐荪、叶楚伧……1907年，苏曼殊与包天笑于上海国学保存会再次相聚，连日宴饮。1909年春天，苏曼殊在东京与调筝人百助枫子过往甚密，为她拍下不少照片，其中有一帧题有诗词两首"奉寄天笑足下"。1911年12月，正在爪哇任教的苏曼殊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给柳亚子写信，期待"遄归故国，邓尉山容我力行正照"，与南社诸公"痛饮十日，然后向千山万山之外听风望月，亦足以稍慰飘零"。邓尉山位于苏州吴中区光福镇西南部，因东汉太尉邓禹曾隐居于此而得名，前瞰太湖，有梅树成林，素称"香雪海"，风景秀美，所以邓尉山成为苏曼殊的苏州"代名词"。当苏曼殊"北旋汉土"，辛亥革命的成果却已经随风飘散，诗人顿觉无趣之极！苏曼殊加入南社就是在回国初的1912年4月。南社是1909年成立于苏州的文人社团，发起人是柳亚子、高旭和陈去病，取"操南音，不忘本也"之意，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，提倡民族气节，反对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。中国南社纪念馆坐落在苏州山塘街张国维祠内，上海南社纪念馆位于金山区张堰镇新华路姚光故居，这两处如今依然会举办南社学术交流活动或后裔雅集。

苏曼殊与南社文人的交往在晚年更为密切。1916年12月，在复刘半农的书札中，苏曼殊写道："朗生兄时相聚首否？彼亦缠绵悱恻之人，见时乞为不慧道念。"苏曼殊的最后一篇小说《非梦记》就发表在包天笑主编的《小说大观》上。通俗小说家、著名报人叶楚伧即曼殊诗《南楼寺怀法忍叶叶》中的"叶叶"，二人亦有深交，有不少合影留世，苏曼殊也曾为叶氏绘制过著名的《汾堤吊梦图》。另一通俗大家姚鹓雏也是苏曼殊念念不忘的挚友，苏曼殊在多封信中都提到"鹓雏时相见否？"、"鹓雏无恙否？"、"鹓雏时通音问否？"姚鹓雏也赋有多首赠给苏曼殊的诗，在其小说《恨海孤舟记》里，有不少情节以和苏曼殊一起吃花酒为素材。程演生等也是苏曼殊的通俗文学界朋友，常常诗酒唱答。鲁迅在《上海文艺之一瞥》中曾形象地嘲讽通俗小说家与上海花花世界的关系，苏曼殊自然也是"从别处跑到上海的才子"，也是怀抱"泪眼更谁愁似我"的多愁善感，也浪迹洋场、冶游花丛。所以，在诗酒风流上，苏曼殊与民初通俗小说家颇有相同处，至于他与新文学家更深的缘分，倒是另一个话题。

在苏曼殊现存诗作中，最负盛誉的除了书写日本故事的《本事诗》十首，就是写苏州的《吴门》了。1913年上半年，苏曼殊鉴于国内学子学英语无门，与郑桐荪、沈燕谋等相约在苏州编写《英汉辞典》和《汉英词典》，闲暇时常常结伴出游，领略吴越胜景丽色。但美妙的湖光山色未能慰藉诗人的愁心，倒更触发了他怀古伤今之情，于是便有了著名的《吴门》十一首，首首皆为东风客舟中的"物哀"：感愤"万户千门尽劫灰"，伤怀"故国已随春日尽"，惆怅"中原何处托孤踪"……虽然苏曼殊也有长歌浩荡的雄健，如"海天龙战血玄黄，披发长歌览大荒"，如"恒河落日千山碧，王舍浩风万木烟"，但诗人惯写的还是"暮烟疏雨"、"春泥细雨"的姑苏情调，他在轻漫的微雨中寄托个人的细愁纤思或欢欣喜悦，这思绪似乎与生俱来，和他生命的律动如此谐和，只用娓娓道来便自成体制。"白水青山"终不能排遣诗人对于世道的忧思，于是这只倦飞的"断鸿零雁"在最后一首诗中再次表达了对清静之地"红泥寺"的无限心归："白水青山未尽思，人间天上两霏微。轻风细雨红泥寺，不见僧归见燕归。"吴越一带美丽的风光让诗人在迷茫中辨不清"人间天上"，他恍恍惚惚遥想起那泥红色的寺院，好似看到在细雨黄昏中，寺庙迎回了倦飞的燕子，也在细细默念诗僧的归来。"红泥寺"的佛教意象凸显，结句两个"归"字，又不言自明地成就文本一种逃离俗世的皈依之意。

关于《吴门》，苏曼殊曾经闹过两则笑话，从中可以一窥其在苏州游历时的行为风度。苏曼殊很欣赏陆游的《剑门道中遇微雨》，品读"衣上征尘杂酒痕，远游无处不消魂。此身合是诗人未？细雨骑驴入剑门"，会萌生一种强烈的代入感，在杭州时还曾经绘《剑门图》挂在山寺，后来被香客窃去。《吴门》组诗的第一首"独有伤心驴背客，暮烟疏雨过阊门"句，"驴背客"既是借用陆游"细雨骑驴"的典故，又是诗人自况：1913年1月，在苏州阊门附近，苏曼殊确实从驴背上跌下来，"几作跛足仙人"，可不就是狼狈不堪、"惹得吴娃笑语频"的"驴背客"了！另一则笑谈则是1914年5月，《吴门》组诗发表于《南社》第九集，原题《吴门依易生韵》，易生乃沈燕谋别字，当时沈氏根本未曾作诗，何来"依易生韵"？友人看到苏曼殊组诗，就向易生索求原诗，他无以出应，只能"相与一笑"了。

赏游苏州的历代迁客骚人中，苏曼殊素爱龚自珍。龚氏也是一位素怀救世心却又放浪形骸的复杂人物，他曾受佛学于绍升，晚受菩萨戒，48岁时认识了苏州青楼女子灵箫，无限缱绻风流。龚自珍的"三生花草梦苏州"，我以为是历来抒写苏州的诗作中最富深情的七个字了，大概那"梦"里香草与美人俱在？苏曼殊《东居十九首（十）》中有"猛忆定庵哀怨句，'三生花草梦苏州'"，也是据此而言。同是信受佛学却万虑纷陈的有情人，一个"历劫如何报佛恩，尘尘文字以为门"（《己亥杂诗（八十一）》），一个"一自美人和泪去，河山终古是天涯"（《吴门（四）》）——龚自珍和苏曼殊如若同聚苏州，该会引为知己、相见恨晚吧？一个艺术家的生命会困溺于他的时代，却又会在后来者的故事里相处流传，文人间这种惺惺相惜，细品起来真是颇有意味。

闲话百宝箱

杨闻宇

百宝箱是贮存心爱之物的小箱子，习见、平常，《辞海》里也就略去了百宝箱的词条。世间最有名的百宝箱，早在四百年前，已经被杜媺（即杜十娘）抱沉到长江里去了。

挹翠院是燕京名气最大的妓院，知书达理、能歌善舞的杜媺是院中挑大梁的人物。八年之间，她为"妈妈"所致金帛"不下数千金矣"。杜媺自己存有一个密封绝严的描金画箱，深藏不露，连妈妈也不晓得。入院寻欢者，该出之资妈妈收过了，杜媺箱里所藏，是额外所得，属于"五陵年少"主动馈赠。箱里的收藏越是珍贵，越可以证明杜媺的超乎寻常。

媚丽过人却又地位低下，这箱子里也就隐伏着杜媺心底的重大秘密，这秘密就是摆脱受人蹂躏的妓女生涯，步入正常合理的爱情生活。八载为妓，世途艰辛，在这样一个特殊环境里经历了诸色人等，杜媺深知知己之难遇。所以，对于好不容易选中的这个李甲，进一步考察的过程中就异样地谨慎、缜密。由于箱里所藏与左右世情人心的"经济"二字密切相连，这箱子自然就成为考察李甲的一块特定的"试金石"，即使在最困难的当口动用箱中之物以应急，李甲也无从窥知内中底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李甲代表着一个阶层与群体，他背后是父亲李布政，而李布政正是政治与经济的巨大化身。杜媺所要追求的爱情，如鲤鱼之跃龙门，终究要穿越这一道严峻的壁垒。

杜媺是一个纯洁化、理想化了的"纯情"妓女的形象，被她相中的李甲，是个没有定见的角色。与同类项的柳遇春比照，够不上好人；与盐商孙富比照，也算不得坏种。李甲在贪恋杜媺的美色时，也还是有爱情的，但爱情处于摇摆状态，时而倾向于杜媺，时而又惧慑于威严的父亲。杜媺耐心地、一步步地等待与考察，正是想将爱情最终定准于自己的这一边。

由于众姊妹及柳遇春对纯洁爱情的合力扶持，杜媺与李甲得以脱离燕京妓院而向李布政所代表的家庭进发；距家门愈近，李甲就越是要考虑到政治与经济这两重生存因素的威逼。行至瓜洲，因为"毒化剂"孙富的介入，李甲终于向家庭的强大身影屈膝下跪，背叛杜媺，答应收纳孙富的一千两白银，将杜媺卖给孙富。骤然闻变，石破天惊，在杜媺心里翻腾的是三重悔恨：一悔自己八年择人而失误，二憎李甲之驴粪蛋子外面光，三恨以李布政面目出现的狰狞现实。难能可贵的是，极度伤心痛苦的杜媺"泪如雨下"，却没有像通常女性那样对负心汉戟指痛骂，只是"冷笑一声"，之后的一系列安排——镇静、从容，果决、坚定而毫不乞怜……

杜媺投江之前，将一屉比一屉珍贵的宝物掷投于江，"李甲不觉大悔，抱持十娘恸哭"，此时恸哭的李甲，或许已不限于对价值连城的珠宝之痛惜；而杜媺之悔断肝肠，难道会仅仅是因为爱情破灭吗？

屈原怀石而投汨罗，杜媺是抱着百宝箱而投长江。在小说里，百宝箱原本是杜媺爱情艰难进程中隐伏着的一条轴线，最后由杜媺抱着投江，分明是变成了投向阴霾的激雷闪电，嗣后又静影沉璧，化作了水底皎月。

优秀的小说是无法面壁虚构的，我相信"杜媺"在生活中实有其人。问题是，到了如今，面对金钱与爱情，会不会有人认为杜媺是个十足的傻瓜，而李甲、孙富，反倒是明白人呢？

『文汇笔会』微信二维码